



明朝时期四夷馆之东南亚朝贡国馆研究 A Stud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n Si Yi Guan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ogong* Trade

李树娟¹

LI SHUJUA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liivy0101@gmail.com

李寅生²

LI YINSHENG

广西大学文学院，中国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P.R. China

E-mail: lys31199@126.com

Received: 22 March 2024 / Revised: 24 March 2024 / Accepted: 12 June 2024

摘要

四夷馆作为中国明朝的一个外事机构，不仅为明朝与东南亚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提供了语言服务，还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培养了许多外语人才。本文通过梳理史籍文献和书写，进一步拓展研究朝贡贸易体制下明朝四夷馆东南亚译学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明朝在四夷馆东南亚译学发展过程中的教育政策、招生方法和教学管理等方面值得当代外语教育教学借鉴，亦可汉语作为外语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朝贡贸易；四夷馆；译学；东南亚朝贡国

ABSTRACT

Si Yi Guan, as a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not only provided language services for the *Chaogong* trade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served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hat trained man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to further expands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transl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s Si Yi Guan through the coll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writing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ing Dynasty's educational policies of foreign languages, recruitment methods of students,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in Si Yi Guan are worth learning from for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dditionally, it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pread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Chaogong Trade, Si Yi Guan, Translation, Southeast Asia Chaogong Nations*

引言

“怀柔远人”、“万国来朝”作为明朝开国皇帝与四夷外交的态度和原则，使得中国封建朝贡贸易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达到新高度。朝贡作为贸易的手段，实现文化感化才是明廷与四夷的邦交目的。语言作为实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明朝政府与东南亚朝贡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服务保障。

永乐五年，明朝政府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通事，翻译四夷朝贡国家语言文字，是明朝政府正式的翻译机构，需要负责明廷各司衙门与四夷邦交国家之间往来文书翻译。（张廷玉等，1980，卷 72，官一）明朝的四夷馆也是明朝政府学习研究与之交往的朝贡国家语言文化的一个研究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高玉霞、任东升，2023；董晓波，2012:234）。

为确保朝贡贸易顺利开展，明廷在四夷馆专设东南亚朝贡国语馆，展开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不仅限于贸易谈判，还包括文学、科技、宗教等多个领域。因此，承担译学任务的四夷馆馆别设置、译字生培养、师资培养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要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完善。良好的语言服务在明朝与东南亚朝贡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商贸与文化交流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频繁，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是促进双边经贸、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要素。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史籍文献和书写，分析朝贡贸易体制下明朝为服务朝贡往来在译学研究与应用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揭示其为当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语言交流和语言服务方面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一、研究综述

目前，对明朝四夷馆进行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比较少，余定邦（1985:21）曾对明代四夷馆的位置、招生制度及对四夷馆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与明朝四夷馆整体研究缺失的情形不同，关于明朝四夷馆某一方面的学术成果则不少。乌云高娃（2005）分别介绍了中国与朝鲜两国主司翻译事务的外交机构，并论述了明朝四夷馆女真馆的教学情况。乌云高娃、刘迎胜（2002）分析了四夷馆的设立与演变情况，重点介绍了鞑靼馆翻译外交文书的职能及该馆的蒙古语教学情况。特木勒（2009:174-175）专门考证了四夷馆保留一整套但却无实权的官僚机构，并考证南京四夷馆和北京四夷馆功能之分。任小波（2012）聚焦研究了西番馆的情况，并提及了明代四夷馆的设置与变迁情况。

在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受朝贡贸易的影响，明朝政府专门开设了负责外事活动和语言事

务的四夷馆，以促进外交和贸易的发展。任萍（2007）认为，四夷馆负责翻译外交文书以及培养翻译人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学校。刘迎胜（1998）作为早期研究四夷馆的学者称之为“亚洲研究院”。张秀燕（2008）则从更广、更深的层次研究分析了四夷馆，并认为它还是我国最早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授功能的研究机构，除了聘请通晓本族文字的人士执教，还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张慧玉、俞晔娇（2020）则强调，四夷馆不仅负责翻译工作，还涉及到人才培养，并且具有相对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在中国翻译和外语教育史上，四夷馆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京城民间少数民族及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有利于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间的融合，同时也推动了明朝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明廷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间语言和文化交流。从外语教学史的角度论述明代四夷馆的论文还很多，包括办学体制（葛治伦，1987）、教学方式（张美平，2011）、学生评价与考核（韩霜、陈光玖、陈鹏，2015）。四夷馆绝非简单的外语教学机构，它还承担着翻译朝贡表文、伴送朝贡使臣回国、差官到边境地区验放进贡夷人、陪祀、参与宴会及编写外国语词典等多项职能。（李红梅，2015）

海外学者对明代四夷馆的研究角度多集中在职能和功能上。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1927）的研究集中在《明史》中四夷馆自明弘治七年以后隶属情况。栗林均（2021）和更科慎一（2021）的研究分别集中在鞑靼馆和高昌馆，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文献分析两馆的外交职能和翻译工作。威立德(N. Wild)和伯希(P. Pelliot)的研究集中在四夷馆的结构、职能以及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Norman, 1945)威立德通过大量史料的分析，展示了四夷馆如何在多语言、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翻译和外交工作。总的来说，海外研究的焦点还是集中认为，四夷馆不仅是一个翻译机构，更是一个外交事务的枢纽，专门负责对外交流和翻译工作。这些研究反映了明朝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对外交的重视和对翻译工作的需求。

综上所述，学者对四夷馆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材料，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馆别研究聚焦在北部和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语馆，女真馆、鞑靼馆及西番馆；语言应用研究体现在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海外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四夷馆的职能和功能方面。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认为，以明朝时期东南亚语馆为主题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将以明朝时期东南亚朝贡国译学为研究对象，以《明史》等古籍文献作为史料，进一步拓展朝贡贸易体制下明朝四夷馆的译学发展情况，以期为汉语作为外语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提供一些参考。

二、东南亚和东南亚朝贡国

东南亚是指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区域。中南半岛因位于中国以南而得名，南部的细长部分叫马来半岛；马来群岛散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广阔海域。因此，东南亚地区国家主要包括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等。

明朝初期对外政策方面，洪武帝以睦邻友好为原则，积极开展海外交流，出使国家之多，始终与邻国保持封贡关系，不征诸夷。太祖留下祖训，把西南小国列为不征之国：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刺、爪哇国、三弗齐国、渤泥国。”（朱元璋，2002：5-7）

由此，本文所指的明朝东南亚朝贡国主要包括安南、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爪哇、蒲甘等古国。由于四夷馆所设东南亚朝贡国语言中只有缅甸、暹罗和八百国三个专馆，其它语言多分散在别馆之中，本文中的统计和论述多集中在上述三个专馆语言。

三、四夷馆东南亚语馆设置

四夷馆的建设主要是为朝贡服务的，这一目的在《明史》中明确记载，四夷馆“分掌诸蕃朝贡、接待、给赐之事。诸蕃朝贡，辨其贡道、贡使、贡物、远近多寡丰约之数，以定王若使，迎送宴劳，庐帐食料之等，赏赉之差……凡审语言、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张廷玉等，1980，卷72，官一）翻译四夷语言文字是四夷馆的基本工作，同时还需培养后继翻译人才。译字生还需负责接待朝贡使者，处理各朝贡国朝贡方物、贡使和贡道情况、迎来送往以及明朝给与朝贡国使者等人的赏赐相关事宜。可见，四夷馆不仅促进了明朝政府与朝贡国之间朝贡贸易往来，还促进了双边在语言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

《四夷馆考》记载：“国家声教四记忆，莫不尊亲，梯航而至者，岁，且接踵昔西邸越裳，憬慕周治，重译来享象胥氏，通其语言，厚其委质，授其符，即以……明初，馆事继之馆师。”（张文德，2000）可见，明朝四夷馆重视翻译，厚待翻译人员。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古国，明廷持同样的态度，与之交往，必先了解对方。《四夷馆考》（序）记载：“……言语不同或居蛟官蜃之中或处水月霜天之下，惊涛白日，……盛德何以柔猿人。”（张文德，2000）明朝以“怀柔远人”迎“四夷来朝”与包括东南亚朝贡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强调翻译的重要性。

东南亚各国语言文字的翻译在永乐年间开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根据《明史》，从永乐五年起，直到万历中期，明朝在四夷馆共设有十馆，其中东南亚馆包括缅甸馆、八百馆和暹罗馆，详见表-1。

表-1 明朝永乐至万年时期所设译馆（张廷玉等，1980，卷72，官三）

时间	馆别
永乐五年	蒙古馆、女直馆、西番馆、西天馆、回回馆、白夷馆、高昌馆、缅甸馆
正德中	八百馆 ¹
万历中	暹罗馆

关于东南国家语言馆的设立，在其他汉古籍文献中也有记载，最早建设的是缅甸馆，其次是八百馆和暹罗馆。根据《明会要》记载：“永乐五年二月甲子，设四夷馆，蒙古、女真、西番、西天、

¹ 八百，指东南亚古八百国，地处泰国北部，今清迈和缅甸接壤一带。

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隶翰林院.....正统六年(1441)增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暹罗馆。”(张廷玉等，1980，卷314，云南土司二，麓川；龙文彬，1956:665-666)

(一) 缅甸馆

自洪武元年期到弘治期间，东南亚朝贡国与明廷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非常频繁，有百次之多。三个东南亚馆中，缅甸馆建设最早，这源于明朝与缅甸之间的特殊关系。根据文献记载：“明初，设缅字馆于滇垣，令汉人习而译之。(缅甸)虽十年一贡，然其输诚之奏，纳款之文，仍不时上达。亦当事者所宜讲求也。考缅字授自缅僧，有深浅优劣之别，精者知晦明风雨，日明剥蚀”。(张廷玉等，1980，卷315，云南土司三，缅甸)

自洪武十五年，因明廷与缅甸之间的军事活动，“明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土蛮思伦发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纶发为宣慰使。十七年八月，纶发遣刀令孟献方物，并上元所授宣慰使司印。诏改平缅宣慰使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纶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张廷玉等，1980，卷315，云南土司三，缅甸)因此，自明朝早期起，缅甸从未间断向明朝廷贡献方物。虽然缅甸与明朝之间战争不断，但是朝贡也不断。之后，明太祖亦不断遣使赍诏谕。因此，明朝还在京师设有缅甸馆，专事调解缅甸阿瓦王朝与中缅边境各土司之间的纷争。

(二) 暹罗馆

暹罗馆虽然成立于万历七年(1579年)，但是暹罗译字的历史从弘治时期就开始了。据记载：“弘治十年(1497年)，暹罗入贡时，明朝四夷馆无暹罗译字官。阁臣徐溥等请移牒广东，访取能通彼国言语文字者，赴京备用，从之。”(张廷玉等，1980，卷323，外国传五，暹罗)正德十年(1515年)，“(暹罗)进金叶表朝贡，(四夷)馆中无识其字者。阁臣梁储等请选留其使一二人入馆肆习，报可。留下的来使入馆后，先习汉语，然后传授泰语。待学生学习期满，暹罗教习便返国。”(张廷玉等，1980，卷323，外国传五，暹罗)至此，明四夷馆正式开设暹罗馆，开始以官方名义为朝贡贸易提供暹罗国语言服务。

(三) 其它语馆

洪武二十六年，八百国开始遣使入贡，“帝乃令西平侯沐春遣使至八百国王所，谕意：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刺至进方物，劳赐之。”(张廷玉等，1980，卷314，云南土司二，麓川)这是八百国朝贡的开始，直到正德中期，八百馆才真正建立。其他东南亚朝贡国的文书，如占城、真腊、爪哇、满刺加等，由于当时他们都信奉回教，所以“遇进贡番文”则由回回馆代译。(吕维祺，2007:50)

可见，主管对外翻译事务的四夷馆真正为之服务的还是明朝与东南亚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外事接待，承担了明朝政府与东南亚朝贡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四、四夷馆语言学习环境

永乐五年，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明廷命礼部选国子监生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遇开科仍令就试，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吕维祺，2007:50）但是，四夷馆的语言学习环境和人才培养机制也是经历了从薄弱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为此，明政府采取了很多鼓励措施，促进四夷馆发展为朝贡贸易提供语言服务。

（一）译字生研习意愿弱

四夷馆是一个“译学”机构，兼培养“译字生”的重要责任。由于历史原因，主动研习译学，考取通事职位的人数很少。古代中国多以“天朝”自居，周边小国被称为“四夷”，东南亚朝贡国的语言更是多被轻视。以越南语为例，越南史籍曾记载宋朝讽刺其为“鸟言”。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八月，宋帝下诏出师来侵。遣卢多逊赍书告曰：夫中夏之于蛮貊，犹人之有四肢也……尔民飞跃野人也，我有车马；尔民鼻饮，我有酒食；用革俗也。尔民断发，我有衣冠；尔民鸟言，我有诗书，将教尔礼也。”（刘志强，2022:202-203）

这种轻视周边国家语言、文字的态度在明朝开设四夷馆时仍表现明显，是人不愿选择做考取通事的一个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思想在明朝也不例外。由于朝贡贸易仍然为“商”，人们重视“士”而轻“商”，不愿研习译学为朝贡贸易服务。永乐十九年(1421)，“上谓诸番字，中国宜解其义，因选太学生聪明者习之，诸生多不悦，辄生谤议”。（徐学聚，1993:3920-3921）尽管朝廷重视“译事”，士大夫重视“科举出身”的传统思想依然是“太学生”们不情愿学习“四夷”文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政府鼓励政策强

明朝重视与东南亚的朝贡贸易往来，尤其是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使节在东南亚各朝贡国都会经停，并广泛赏赐或回赐朝贡国。因此，自永乐帝起，政府更加非常重视译字生的培养了。四夷馆的招生堪比国子监选拔贡生，严格要求，层层选拔。“译字生，明初甚重。与考者，与乡、会试额科甲一体出身。后止为杂流。其在馆者，升转皆在鸿胪寺。”（张廷玉等，1980，卷74，官三）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把关生源质量，这说明明朝政府对四夷馆译字生的重视，进而体现明廷重视与四夷的交往，真正体现“怀柔远人”的大国姿态。

朝廷为鼓励国子监贡生和士子加入译字生的队伍，明朝洪武、永乐、正统、弘治等数位皇帝都曾亲自下谕旨督学四夷语言文字，这是前代历史所没有出现过的。《四夷馆则》收录两道督学四夷语言文字的谕旨。明朝正统九年诏谕：“圣谕朝廷怀抚四夷，因其言语文字不通，所以授译字官以达其情，比先选监生、官民家子弟习学，有成效的都与他职事。”（吕维祺，2007:519）明朝政府把选拔四夷馆译生比肩选拔国子监的贡生，不分家庭贫富，只要学有成效就可赋予官职。这道谕旨其实也点明了明朝对译字生的重视，无贵贱之分，为才学至上。弘治三年(1490)，皇帝也曾亲自下谕旨督

学：“礼部尚书耿等题奉钦依四彝（夷）馆子弟务要专工习学本等艺业，精通夷语，谙晓番文，以备应用”。（吕维祺，2007: 50）弘治七年(1494)，四夷馆又增设太常寺卿、少卿一员，正三品官职。（吕维祺，2007: 52）

明朝政府通过官方正式文件设置译字生的招生、培养政策，激励并提升译字生的社会地位，不论出身为其提供“官员”职位待遇，改变了译字生为“商”服务的底层心理认知，体现了公平选才，唯才是用的教育态度和原则。

（三）馆则严谨规范

四夷馆成立十五年后逐渐加强译字生的教学管理和教员管理，规定教员需专心工作，不可像今天社会上的语言培训班那样私自招生译字生，否则将受到朝廷的惩罚。天顺年间，“礼部奏……近年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子、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学习，滥求用番字文书，多开旁务教习，既滥，不免透漏夷情，乞求翰林院今后各馆有缺，仍照永乐间例，选取年幼俊秀监生送馆习，教师不许擅留各家子弟私习，及徇私举保。今后敢有私自教习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张廷玉等，1980，卷 74，官三）成化初，“四夷馆译字官生见有一百五十四员名，而教师马铭又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为礼部所劾。宪庙命礼部会官考选，精通者量留，余送吏部改用。子弟俱遣宁家，后有私自教习者，必罪不赦。”（张廷玉等，1980，卷 74，官三）

严格的教师资管理和译字生选拔充分体现了四夷馆东南亚译学在明朝与东南亚朝贡往来过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四夷馆的教师和译字生在与外国使节交流时扮演着文化输出的角色，通过对教师和译字生的严格选拔，明廷能够确保派遣到四夷馆的人才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和对外交流技能，能够胜任复杂的朝贡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重任，通过语言交流和文化解释，向外界展示明朝的文明和文化。选任资格优秀的人员，不仅可以确保外国使节在明朝境内得到准确的翻译和解释，增强明朝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也有利于传播明朝的文化和价值观，彰显文化自信。

五、东南亚馆译字生教员

明朝四夷馆中东南亚各馆官员规模不小，根据《四译馆则》的记载，缅甸馆最多，为二十九人；其次为八百馆，有十九人；再次为暹罗馆，有十七人。（吕维祺，2007: 52）但真正担任教学任务的人员不多，管理人才缺不少。为此，明朝设立的专门用以接待外国来使的会同馆安排了不少通晓东南亚朝贡国语言文字的通事为四夷馆工作。《明会典》（申时行，1989，卷 109）记载了八个东南亚朝贡国语种，十四位通事的情况，见表-2。

表-2 会同馆东南亚国通事表

国别	安南	真腊	暹罗	占城	爪哇	苏门答刺	满刺加	缅甸
人数	2	1	3	3	2	1	1	1



此表显示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由于东南亚朝贡的覆盖面比较广，四夷馆对诸如安南、真腊、占城、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等国家未单独设馆，会同馆的通事补充了这些国家语言的通事作为教员。第二是：教员明显不足，明朝廷不得不想方设法补充教员。

当时，补充教员通常采用三种方法：让原来的教员子弟继承教员工作，继续教习译学；到东南亚朝贡国招聘教员或者到明朝西南边境招聘通晓东南亚语言的边民；留朝贡使臣或随行人员在明廷负责教习东南亚语言。《四译馆则》记载：“本馆(四夷馆)年深教师在任病故，子孙通译无过者为世业子弟，比例陈情送馆继业.....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缅甸馆教师序班夏凤朝男、夏继恩比例.....”（吕维祺，2007: 519）除此之外，明廷明礼部到与东南亚陆路接壤的国家边境调查，考核招聘教员，并且提供“官员”职位。《四译馆则》记载：“先年各馆缺人教译，具承内阁行礼部，请束力各边防，取谙晓番译人员赴部考验，授以官职，送馆教译.....”（吕维祺，2007: 53）对于实在无法自主培养，亦或无法招聘到教员的语言，政府采取了最直接的办法，即是留贡使做教员。贡使留做教员成为了中国早期的外教。中国缅甸语、暹罗语、八百国语就属于较早外教情况，如下表-3。

表-3 明朝缅甸语、暹罗语、八百国语早期外教情况表（吕维祺，2007: 60）

馆别	缅甸馆	暹罗馆	八百馆
通事教员名字	当丙、云靖、 的酒、孟香	握闷辣、握文帖、 握文铁、握文源	蓝者哥
其他	其中：的酒，字靖之，缅甸土夷，弘治十七年(1504)取进，历光禄寺署丞教师；孟香，字德馨，缅甸土夷，弘治十七年(1504)取，历光禄寺署丞教师。		

（一）缅甸馆教员

缅甸馆建于公元 1407 年，在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 年)。明朝政府曾留下随缅甸使团来华的当丙、云靖等六人在缅甸馆任教，并授予“班序”官职，六人皆卒于官。（吕维祺，2007: 60）这是聘请缅甸外教教授缅语的开始。弘治十七年(1504 年)，明政府命令云南地方官请缅甸派人来华任教。同年，缅甸政府遣使派送三位通事到访明廷并留下任教。明政府授予此三人鸿胪序班官衔，后来的酒和孟香均晋升为光禄寺署丞。（钟智翔，2012:3-4）

缅甸馆也有若干中国教习，其中资格最老的是安徽歙县人方英和云南腾冲人刘坤，他们都在弘治三年(1490 年)任教，各为光禄寺署正教师和通政司知事教师。（威廉·史金纳、王云翔，1962）缅甸馆以正德四年(1509 年)留任的中国教习为最多，共十人。从弘治三年到万历三十二年(1490- 1604 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者有二十八人，缅甸馆教习有父死子继的惯例，称为“继业生”，有姓名可考的继业生，先后有赵继隆等十人。（吕维祺辑，2007: 60）

(二) 暹罗馆教员

明朝初期，暹罗与明廷友好，双方互相遣使对方国家教授语言文字。洪武四年(1371 年)，暹罗就派出留学生入明朝国子监。已有研究证明，古代中国和大城国王互相送金叶书，以巩固友谊。因为缺乏有经验的翻译人员，中国皇帝不能了解它的中心意思，就派四位有学问的人到中国来担任常驻服务员，此后所有的金叶书都得到完好翻译。(威廉·史金纳、王云翔，1962)《四译馆则》记载：“.....暹罗国王近年屡差进贡，所有金叶表文无从审议.....今该国起送通晓番字人员前来教习。今据广东布政司查取，夷使握闷辣等三员送翰林院开馆教习.....。”(吕维祺，2007:60) 万历五年(1577 年)，明朝政府开始从暹罗聘请通事到华教习，当年共聘请了四位同事；次年，暹罗馆成立，招收马应坤等十二名译字生和握闷辣、握文帖、握文铁、握文源等教员。(吕维祺，2007:60)《四夷馆考》(序)中还记载了四夷馆提督王宗载向暹罗教员学习的情况：“余承乏指督，会暹罗使者来庭，始辟馆受译。课业少间，辄进夷使而询之，具述彼国之山川、道里、食货谣俗，如在掌股间。”(张文德，2000)

八百馆也曾缺少教员。《四译馆则》又载：“正德八年(1513)，因八百、老挝等处译语失传，该内阁题请暂留差来头目开馆.....。”(吕维祺，2007:52) 为了吸引、留住译字生教员、译字官和译字生教、学习东南亚朝贡国语言，明朝还在俸禄方面给了很大的支持。可是，由于管理等原因，再加上国势衰微，嘉靖二十五年 (1546)以后，四夷馆涣散不堪，出现了缅甸馆师生全无；万历六年(1578)，暹罗国王遣使进贡，所有金叶表文无人能够审译，又专门增设了暹罗馆；崇祯元年(1628)，明朝进行了最后一次译字生的招生考试。(黎难秋，2022:426-427) 四夷馆东南亚语言译字生和教员的招生、招聘和管理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和波折。

六、东南亚语言译字教材

明朝重视翻译“四夷”语言文字的时间要比四夷馆的成立还要早。《国朝典汇》记载：

“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文字行天下，乃会翰林院侍讲火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其载，复取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谐其声音，名华夷译语。即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来，莫皆能得其情。”(徐学聚，1993:3920-3921)

随着《华夷译语》的不断完善，其也成了汉语和东南亚朝贡国语言翻译的教学材料，其中收录了不少东南亚朝贡国的语言和汉语对应的词汇，与此同时收录东南亚语言词汇的译学教材还有《四夷广记》，按国别总结如下表-3。

表-3 明朝四夷馆东南亚语种翻译教材情况（徐学聚，1993:3920-3921）

语种	收录	编者
安南译语	《华夷译语》、《四夷广记》	（明）茅瑞徵、 （明）慎懋赏
满刺加译语	《华夷译语》：四百八十二词条	（明）茅瑞徵
暹罗译语	《华夷译语》：一卷，汉文和暹罗文对照	（明）茅瑞徵
	《四夷广记》：四个象语，天—普刺、地—佃因、日—脉、月—晚	（明）慎懋赏
爪哇译语	《四夷广记》：四个词语：珍珠—没爹暇罗、犀角—低蜜、象牙—家罗、香—崑火敦罗林	（明）慎懋赏
真腊译语	《四夷广记》：包含时令、数目、人物、人事、饮食、器皿、禽兽类别等四十七条	（明）慎懋赏
缅甸译语	明朝无记载。	

《华夷译语》和《四夷广记》作为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许多关于东南亚朝贡国的语言和文化。这些教材主要为四夷馆的译字生或明朝与东南亚朝贡国双边朝贡商人、官员和使者提供了解对方语言的词汇、常用短语和基本语法规则，以便更好地促进贸易、外交和文化交流。但是，它们不是完整的语言，可以说是为特定目的而设置的专门用途词汇，只能在特定交流场合下使用，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尽管如此，这套早期的翻译教材不仅是了解当时明朝华人对外界的认知、观念及语言交流历史证明资料，更是体现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东南亚语言的态度。教材中收录的译字词汇和语言规则为明朝与东南亚朝贡贸易和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媒介，同时也证明了文化交流对语言变迁的影响。

结论

明朝与东南亚朝贡国在朝贡贸易过程中，四夷馆东南亚朝贡国语言译字生的培养、教员的选择和教材的制定为双边朝贡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和有效的语言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四夷馆在人才培养机制、师资配备、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明朝在语言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进性，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语言文化交流和研究，为汉语在东南亚国家的教学和应用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可有效促进汉语在东南亚的国际传播。

（一）增强语言能力可促进对外贸易有效进行

通过语言沟通，商务人士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商品信息和价格，从而提高了贸易的效率和顺畅度。明政府在永乐年间建立的“四夷馆”以及随后增加的“暹罗馆”、“缅甸馆”、“八百馆”等培养了可促双边朝贡贸易顺利开展的通事人才。互通彼此的语言，朝贡贸易双方有了沟通的桥梁，相互

理解和信任有了依据。语言为贸易双方的商务洽谈、交易协商和信息传递、利益保护、交易公平与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双方可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拓展贸易网络，进而开展有效的贸易活动。

（二）激励机制可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意识

东南亚国家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乡音，但汉语和英语也是广泛使用的语言。今天，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彼此已成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贸易的发展一定需要语言搭建沟通的桥梁。无论是汉语学习，还是英语及其他东南亚语种的学习，政府、教育机构、公司企业等都可以借鉴明朝政府的语言激励措施，逐渐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意识，进而提高学习者的语言知识水平和语言应用能力，反向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三）制定符合环境的语言学习管理体制

当代汉语和东南亚国家语言教学需求和交流更加需要重视环境和背景。商务文化交流有助于丰富语言教学内容、拓展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法。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彼此经贸发展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逐年提高，汉语作为外语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日益明显，东南亚地区对汉语学习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历史上朝贡贸易促进东南语言在中国传播这一经验，制定符合东南亚国家环境的“教”、“学”和“管理”的具体措施，提高东南亚国家学习者的汉语学习效率。

（四）促进制定灵活的现代语言政策，更好地应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多语言服务的需求

四夷馆作为明朝时期中国专门处理对外翻译和交流的机构，其运作和经验对现代语言政策有多方面的可借鉴性。四夷馆的历史实践展示了在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处理翻译和外交事务的有效策略，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重视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言人才培养，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需求；建立翻译和语言研究专业机构，提升翻译质量和效率；制定标准化的翻译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确保翻译工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特别是在法律、科技、外交等关键领域；加强语言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编纂、出版多语种词典、教材和参考书，支持语言学习和研究。这些策略对当代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董晓波. 翻译概论. [M].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
- 高玉霞、任东升. 作好国家翻译实践规划, 助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任东升教授专访.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5(2):149.
- 余定邦. 明代的四夷馆. [C]. “庆祝中山大学建校六十周年(1924—1984): 东南亚历史论文集”.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 乌云高娃.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 [J]. 中国史研究, 2005, (1):127-129.
- 乌云高娃、刘迎胜. 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2, (4):62-68.
- 特木勒. 迁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 [C]. “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2009.
- 任小波. 明代西番馆职司与史事述考. [J]. 西藏大学学报, 2012, (3):87.
- 任萍. 记我国最早的翻译学校——明四夷馆考察. [J]. 上海翻译, 2007, (02):53-56.
- 刘迎胜. 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 [J]. 江海学刊, 1998, (03):112-118.
- 张秀燕.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学校——明朝四夷馆. [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6):324-325.
- 张慧玉、俞晔娇. 明朝四夷馆的人才培养及其对 MTI 教育的启示. [J]. 上海翻翻译, 2020, (03):80-84.
- 葛治伦. 我国最早的一所外文学校——明代的四夷馆.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 (2):52-53.
- 张美平. 明代四夷馆翻译教学述略. [J]. 中国科技翻译, 2011, (2):63-65.
- 韩霜、陈光玖、陈鹏. 管窥明代四夷馆中的学生评价体系与考核制度. [J]. 兰台世界, 2015, (27):42-43.
- 李红梅. 明代四夷馆的设立与外语教学活动考辨. [J]. 兰台世界, 2015, (15):106-107.
- (明)朱元璋. (2002). 皇明祖训. [M]. 北京: 北京图书出版社, 2002.
- 张文德. 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 [J]. 边疆史地研究, 2000, (3): 89-100.
- (明)龙文彬. 明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清)吕维祺辑. 曹溶, 钱坫增补. 四夷馆增定馆则·新增馆则.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刘志强. 中越文化交流史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2022.
- (明)徐学聚. 国朝典汇.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明)申时行. 明会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钟智翔. 缅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世界图书上海出版公司, 2012.
- 威廉·史金纳、王云翔. 古代的暹罗华侨. [J]. 南洋资料译丛, 1962, (02):107-124.
- 黎难秋. 中国口译史.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22.
- (明)徐学聚. 国朝典汇.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神田喜一郎. 明について四夷館だ. [J]. フリント, 1927, 12(4):9.
- 栗林均. 乙種本「華夷訳語」鞑靼館雜字におけるモンゴル文語の特徴. [J]. 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紀要, 2021, (51): 1-23.
- 更科慎一. ウイグル語学習書としての『高昌館来文』の性質について. [J]. 異文化研究(山口大学人文学部) 第, 2021, (15): 66-81.
- Wild Norman.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Ssu I Kuan 四夷(译)馆(Bureau of Translators).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01.XI-3, 1945, 617-640.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LI SHUJU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usiness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China-ASEA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ddress (地址):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mp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atana Road,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rn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LI YINSHE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P.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No.100 Daxue Rd., Nanning, Guangxi, P.R. China. 530004

